



鯨魚行動

● [美] 威廉·弗·布克雷著
● 高雁魁 等译
● 昆仑出版社

鳄 鱼 行 动

(美) 威廉·弗·布克雷著

高雁林 吴闻中 李正平 耿大权 译

乃辛 韵声 校

昆仑出版社

DQ10/26

鳄鱼行动 [美]威廉·弗·布克雷 著

高雁魁 吴闻中 李正平 耿大权 译

西班牙文翻译 吴广孝 乃辛 韵声校

责任编辑 李德成 封面设计 章桂征

昆仑出版社出版 727×1092毫米32开本 10印张200000字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8年7月第1版

桦甸市印刷厂印刷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40-091-3/I·82 印数1—100,000册

定价 2.80元

1

西西里奥·维拉斯科驱车驶回查普尔德培公园，然后向右拐去，驶上阿萨尔托大街，朝考塞参开去。许多年来，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只要他一回墨西哥城^①，就得去一趟那里。或许光坐在车里遥看此地，他也会理清那遗留在他心中的一种混乱情绪。这种混乱情绪是他长期崇拜那个可怕的神的结果。难道说这是一种渴求重游犯罪现场的病态欲望吗？

一个滔天罪行，一个一直令他烦恼不安的问题。如果说暗杀列昂·托洛茨基是个“滔天”罪行，那是因为当时该事件是几个星期中国际上瞩目的中心，并且它的影响所及持续了数月，甚至数年。众多的托洛茨基追随者们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他们的领袖，而历史又证明的确无人能代替他。这个罪行被正式地下定义为“取一个人的性命”，因为维拉斯科、霍达多和墨卡德（当时是墨卡德挥起登山斧击中了托洛茨基的头部）当时几乎不是执行一项什么民事使命。维拉斯科将

① 墨西哥首都。

车子向西驶往考窑参时回想起来，在这种情形下所正式使用的用语是“杀害一个无辜者”。因为在墨西哥法律范围内，托洛茨基也许——很可能——没犯任何大罪。那么，难道说他清白吗？当时他——劳尔·卡雷拉的宗教狂热是多么可笑！

1922年，22岁的劳尔·卡雷拉正在巴塞罗那^①的法律学院读书。但是不久，他听家里说他必须得辍学，原因是他家里已财力耗尽，父亲又没遗留下什么东西，只有那幢窄小但押金却很高的房子。劳尔的5个姊妹和母亲都住在这里。他一想到自己不能修完法律课就非常伤心。然而，使他感到绝望的是，他将失去与同伴们的联系。他的这些伙伴象他一样，都深深地受着苏联伟大事件的影响，并为之深感激动。自从列宁4月份发表了声明以来，他们已经开始每周至少开四次会。一开始他们只有三、四个人，但是现在人数已达12或15个，而且人数增长是稳步的。他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讨论俄国的发展情况，并且研究如何在他们的周围寻找机会，以普及扩大他们在牢骚满腹的人们中间所发现的那股巨大动力。这些牢骚满腹的人尽管为数不多，可他们却反对所有与加士蒂尔^②有关的东西，而其中最受他们反对的就是基督上帝和波旁国王。

劳尔承认他很难同天主教割断联系，因为他母亲一直虔诚地信奉天主教。但是他认识到，他又不能仅仅在形式上与陈腐、传统的西班牙绝裂。他不仅需要脱离信仰，还需要怀疑。须知，人是细胞经过化学与生物偶然结合而出现的产物，这产物又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目的性。历史的伟大事件

① 西班牙第二大城市、最大工业中心，在西班牙东部。

② 从前西班牙北部一王国。

在这个世纪就要达到一个高潮。列宁正在向他的弟子们显示这个高潮将怎样到来。巩固了数百年的阶级模式将被抛弃，穷苦人将会看到，他们的手中掌握着未来，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将永远失去他们所惯于欺压的奴隶。

劳尔的热情与一种非凡的雄辩口才结合在一起，但他绝对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他曾受比阿特丽丝之邀详细讲述过正式法庭辩论与演说的技巧。他同她不仅同吃同住，而且还有着共同的幻想。她提议自己装扮成众多的听众——他们只需去那田园诗般的原野中，谁也听不到他们的讲话。劳尔可以登上一块岩石，使用一个暂代的讲台，来进行公开演说。劳尔这样试了三次，但他总是讲着讲着就变了，变得好象在讨论会上讲话一样。最后，连比阿特丽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计划失败了。劳尔的美妙口才非得留给亲朋好友们听不可了，他不能露脸于公开演讲会。

他的伙伴们都为他要辍学的消息弄得十分难过，尤其是安东尼·奥杜兰更为难过。杜兰当年24岁，因年龄最大而被推为小组的当然领袖。他和劳尔的三个极其要好的朋友星期一晚上碰了一次面，为的是能研究出补救办法，因为这个星期五即学期末，劳尔就该离校了。每学期的学费与饭费一共1000为个比塞塔^①。可是不管他们怎样算计他们大家敛起的财产，也无法凑足那笔钱。而星期五又是规定必须预交下学期费用的最后日期。

他们坐在一间破旧的毫无装饰的教室里，只点着一盏灯。天开始冷了——巴塞罗那的一月份冷得可怕。可他们的谈话却越来越激烈。这时，里科“啪”地拍了一下桌子，要

① 西班牙货币单位。

大家安静下来。里科平时沉默寡言，因此当他要求大家安静时，大家都认为他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而在他们所有人当中，也数里科最富于创造性。当初正是他想起来写那封匿名信的。信里说他们大家所憎恨的院长是个同性恋者。这在1921年的西班牙实际上是个了不得的犯罪行为，为此，这位院长过早地辞了职。

“我有了！我有了！这不仅不成问题，还能给我们以施展革命艺术的机会！我们去抢劫银行。”

大家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里科此时已陶醉欲醉。“抢劫银行，我们不仅可以让劳尔念上书，还可以开始为我们所尊崇的革命运动筹措资金。抢劫银行是个极好的开端，因为对社会主义来说，再没有比银行更大的污辱性机构了。”

“抢哪家银行呢？”赫克托问。

“哪家银行有什么关系，我亲爱的赫克托？它们都是一丘之貉。”

“如果大家都认为所有银行都一样的话，”赫克托说，“那我就想抢那家放高利贷让我父亲抵押自己房子的银行。”

“那是哪一家？”

“那就是萨格拉多·克拉松银行，在乌利诺大街，斗牛场附近。”

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

由于这是里科想出的主意，因此大家就推他为总负责。他指派安东尼奥在银行楼外监视银行的活动，让他坚守岗位，从上午9点开业起到1点钟午休，他需要做些记录。比如要记下警察什么时候和隔多长时间巡逻此地，以及什么时

候银行的顾客达到高潮，等等。他们决定于上午进行抢劫，但是还拿不准具体在上午的哪一刻。因为赫克托定期替他父母向银行交押金，所以他被分派去侦察银行内部的保安措施。在银行里，他可以在抵押证书上错写一个地方而找借口磨蹭一会儿。这是一个无甚大关系的小错，但却需要好一段时间来改正。

他们将于次日下午汇拢收集到的情报。与此同时，孔查要弄些军火武器。“最好弄些手枪，”里科捋着胡须严肃地说，他们4人嘴唇上都留起了胡子——列宁式的胡子，“但是如果弄不到手枪，步枪也行，或者猎枪也行。我们需要”，他停了一下，表情里不乏那种伴随着武装斗争的到来而出现的戏剧感，“一个无产阶级的军火库。”

星期三，他们来到安东尼奥的家，因为他父母到桑坦德去看望他那正在生病的姨妈，家里只剩下了他。他们聚在一起汇拢他们收集的情报。孔查以胜利者的神态从一个大袋子里取出一支0.32口径的手枪。“我从一个正在火车站公厕里拉屎的警察身上搞到了这支枪。”

“他看见你没有？”里科问。

“看见了，可他当时却不能起来追我。”孔查大笑起来，很带有伟大战略家的架式。“别担心，他永远不会认出我。我这胡子很有用。”他又从袋里拿出他父亲的民兵步枪和那支陈旧的家用猎枪。他父亲偶尔用这支猎枪打打兔子或者鸽子。

赫克托汇报说，有一个武装警卫坐在银行入口附近，并且不时地起来遛遛。他还对出纳员的窗子及出纳员的行动做了细致的观察，并推理说，在出纳员附近能伸手够得着的地方也许藏着一支手枪。安东尼奥汇报说，据他观察，只有两

个警察巡逻经过此地，而且总是在九、十点钟之间。他说，在10点半至11点半之间，顾客比较少。而这之后，顾客又开始多起来。

他们决定，里科在11点整时用手枪顶住警卫的后腰眼，并缴下他的枪。与此同时，安东尼奥拿着猎枪冲进门，赫克托拿步枪紧跟其后。赫克托可以威胁任何阻止他们行动的人。然后，安东尼奥要把猎枪对准银行出纳员的前胸，向他要钱，还要详细观察他的举动，以防他伸手够武器。

“安东尼奥向他要多少钱呢？”孔查问：“1000比塞塔吗？”

“何止1000，你这个蠢货。”里科说，“我们这项事业再也不能仅仅为劳尔缴纳学杂费了。这是一次具有革命正义的冒险。我们一定要拿到所有的钱。”

大家对此展开了讨论，最后采取了折衷办法：他们要拿到金柜里的全部现款，而不能冒险逼着出纳员到银行的地下室去取储备金。“记住，我们必须行动迅速，”里科提醒大家。“里外都要快。”孔查要等在一辆计划在早上偷到的汽车里。偷车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在外边大广场上直至几条街里所停放的汽车有一半插着点火钥匙。在1922年的西班牙，偷盗汽车的案件几乎闻所未闻。尔后他们将放亮汽车，并分头散开，最后于下午3点钟在安东尼奥的家里会师。当天晚上，赫克托要去一趟学院的会计员那里，为劳尔·卡雷拉交上那笔费用，并要求校方告诉劳尔，是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捐赠者使得他能够继续上学。

他们群情激昂，随即打开了一瓶安东尼奥的父亲1917年存放的陈年好红葡萄酒。“一个极其合适的颜色，”孔查笑着说，“让我们在巴塞罗那，为真正的革命活动的开始而干

杯。”他们决定都在同一房间里睡觉，以增进他们的兄弟般情谊，并使这一独特的历史时刻得以升华。“也许有一天，”孔查对正准备在躺椅上睡觉的里科小声说，“这座房子将成为一个圣地。”里科庄严地点点头。

安东尼奥左手握着装满钱的枕套，右手拿着猎枪向转门跑去。就在片刻之前，他们曾从这里走进银行。但是当他用力将胳膊肘推向玻璃门时，并没使门转动，却砸碎了门玻璃。就在这时，从某处传来一声枪响。子弹似乎穿透了安东尼奥的胳膊，因为他的猎枪落在了玻璃碎片之中。赫克托冲过来帮助安东尼奥，但是他也没能推开门牢固地关闭着。在他用力推门的同时，里科拿着自己的枪和守卫的枪也跑过来帮助他的同志们。这时又响起第二枪。这次子弹穿透了里科的右手，他的枪支都掉到了地上。一个镇静的声音从他们上方某个地方传来：

“你，拿步枪的，放下枪。”

赫克托扔掉枪，回头看了看里科。里科正在将手腕使劲儿顶着毛衫以止住流血。安东尼奥坐在地上，后背靠着转门，在那里呻吟。

那个镇静的声音来自于二楼的楼台后边，那后边是办公室的位置。那里站着萨格拉多·克拉松银行的行长，65岁的乔斯·露易斯·坎布雷——埃切维里亚。

行长后来向报界解释，这一切都十分容易。他坐在扶手椅上，抽着雪茄烟说，当出纳员被匪徒纠缠时，他只不过把脚踏了一下特制的报警器。行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到这铃声之后，就按了一个电动开关，将转门紧紧关住。然后，他伸手拿起他特意放在办公室门口的步枪，打开门，扫视了一

遍楼下的动静，瞄准那个手拿猎枪的家伙开了一枪，又向那个拿手枪的家伙放了一枪，接着还准备朝拿步枪的家伙搂一火；但是这第三枪已证明没有必要，唐·乔斯先生说着向铜制痰盂里掸了掸烟灰。

在法庭上，里科、安东尼奥和赫克托各被判处10年苦役。孔查和劳尔被当作同案犯而判处5年。尽管他们几个都发誓说劳尔根本没有参与这次行动，但法庭仍坚持原判。检察官争辩说，他们通过搜查劳尔的房间，发现了那里的全部革命刊物，因此说，他对劳尔参予了这次抢劫没有丝毫怀疑。法官宣布判决时，请求上帝宽恕这些年轻的暴徒。劳尔的母亲羞怯地坐在第二排俯首划着十字。她为自己的丈夫不在人世而觉得高兴。

劳尔和孔查被送到山里去挖隧道。这条隧道的设计者打算凿通伊比利亚山脉^①建造一条公路。白天，在重兵看押下，他们穿着显眼的囚服，挖着那似乎没有尽头的隧道，又是劈岩石，又是挖掘山土。到夜晚，他们被卡车拉回阿尔塔米拉监狱。在狱中，他们被剥夺的一项日常权力，就是不得阅读任何东西。这种苦恼几乎将劳尔逼得发疯。为了弥补这种精神生活的匮乏，每天在下工后到吃晚饭之前的几分钟内，他和孔查总是到一个卫兵室外边闲遛遛，以便听一听收音机播放的新闻。在列宁逝世那天，劳尔似乎体验到了基督信徒们在卡尔瓦利^②所经历的那种悲痛欲绝之情。他发誓：等他出去之后，一定要为列宁报仇。

① 在西班牙北部。

②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孔查说他可不理解这点。“西班牙对列宁怎么了，你非得要为列宁报仇？”

劳尔指责孔查没有学好革命的语言。任何对列宁的轻视——苏维埃以外的全部世界都轻视过列宁——都是一种侮辱，都应得到雪耻报应。毫无疑问，他们对里科、赫克托、孔查和安东尼奥的残酷处理（更不用说他们对清白无辜的劳尔的残酷处理了）完全是对列宁的亵渎，因为列宁不仅是位领袖，也是位预言家。孔查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说他祝愿列宁到得雪耻，但是就事实而论，他不得不坦白，在过去的三年中，他发现他的革命欲望减退了，他十分渴望首先同同一个女人睡一晚上，第二，吃上一顿美餐，第三，再不同警察打任何交道。

“难道说，”劳尔摸着自己刮得精光的下须问（监狱当局不允许留胡子。“你想不到胡子里会隐藏什么。”监狱长曾这样宣布过），“你也再不同我打任何交道啦？”

孔查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你同警察没有关系。”

“回答我，孔查。你放弃了你的共产主义信仰吗？”

“不，没有，”孔查说。“如果革命发生了，那我会非常高兴。只是我感觉我不象……以前那样富有革命创造性了。当然”，他用很大的热情说，“我祝你万事如意。”

劳尔知道，若不是由于一个缘故，那他会对此大发雷霆的。那个缘故，就是：孔查陷入这种困境完全是由劳尔造成的。至少是一种最初的冲动，而在那种冲动之下才发展了一种崇高的革命举动。尽管劳尔·卡雷拉仍同孔查保持着友好关系，可他却有了一种醒悟的感觉。

当劳尔·卡雷拉从监狱出来时，他已长了5岁，但是他

要比他27岁的年龄大得多，他的信仰完全成熟了。他到巴塞罗那的火车站打听去马德里的路费。他手头上有100比塞塔，这是他的离狱赏金。但到马德里的路费得120比塞塔，于是他无可奈何地暂时放弃了去马德里的打算。他走出车站，来到卡门大街的公共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着当天的报纸，然后再读前一天的，接着又看杂志。他激动地注意到，这些报纸有好几处提到了共产党，共产党的总部当然设在马德里了。这就是他希望去那里的原因。但就在这时，他无意中发现了在他潜意识中希望找到的消息。这条消息刊登在《旗帜》上，是关于电业工人可能发动罢工的消息。他们的发言人是加布里埃尔·庞西罗。加布里埃尔·庞西罗被推为“电业工人工会”的领袖，还是巴塞罗那共产党的副主席。

劳尔·卡雷拉站起身来。

巴塞罗那共产党！他向四周瞥了瞥，一个人也没有。他用手指将那条报道从报纸上撕下，塞进口袋，迈出图书馆的大门，经过雄伟的科隆石碑，向南走向工业区。他走进米拉格拉斯小酒店，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询问红葡萄酒多少钱一公升，然后把75比塞塔放到桌子上。他把那片报纸摆在自己面前，一杯接一杯地喝起葡萄酒来。他的情绪极其高昂。巴塞罗那共产党，好极了！

一小时之后，加布里埃尔·庞西罗正在亚丁地区的主要电厂的闷热的发电机室里测试一部辅助发电机的电压。一个职员走进电机室说有个年轻人要求见他，如果庞西罗不接见他，他就坚决不走。

庞西罗，三十七八岁年纪，身材魁梧，蓄着胡须。尽管身穿短袖背心，仍然大汗淋漓。他放下电压表，脸上没动什么声色。

“他在哪儿？”

“就在会计办公室的外面。”

庞西罗用毛巾擦了擦双手和前胸，跨出电机室，此时已是夜里10点多钟。他审视着面前这位年轻人：个头不高，身材瘦削，一头不打弯儿的直发，薄薄的嘴唇，一双渴求的眼睛。

“你有什么事儿？”

“我想帮助你们，庞西罗先生。我被警察诬陷过，还在监狱呆了5年。我学过法律。我读过列宁和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我希望加入你们的事业。”

庞西罗一时没有说话，只是上下打量着劳尔。又是一个骗局吗？他寻思着。他对他说：“我住在赫尔克利斯大街332号。12点15分我下夜班，你到那里找我。”

“今天夜里？”劳尔追问。

“是的。”

劳尔·卡雷拉于12点钟来到庞西罗的家，但却等在外面，站在街对过。12点12分，他看见庞西罗走进家门。他又等了3分钟，然后走过去敲门。

庞西罗已经洗过脸，这时，他一句话不说地领劳尔走进厨房。餐桌上放着黑面包、红葡萄酒和奶酪。庞西罗坐下开始吃喝。他除了指指一张椅子示意劳尔可以坐下之外，没向劳尔做任何邀请。劳尔没有去坐。

“讲一讲你的身世吧。”

劳尔讲起了自己的身世，还详细地讲了一、二件可怕的监狱生活的片断。他没有提孔查革命干劲衰退的情形。

“所有这些都仅仅是由于抢劫了银行？”庞西罗问，他嘴里塞满了面包和奶酪，但是他的眼睛却紧盯着劳尔。

“不，先生。所有这些都由于我们没抢成银行。”

“很好，明天早上我们就去抢劫银行。你想加入吗？”

劳尔·卡雷拉顿时脸色苍白。他想起了在阿尔塔米拉监狱的1825个日日夜夜，那凿石苦役的5个年月，那无书可读的4万多个钟头。他犹豫了，但只是瞬间的犹豫。

“我加入，先生。”

庞西罗把他的面包和奶酪盘子推向劳尔这一侧。

“坐下吧，同志。”

劳尔·卡雷拉同志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年轻组织里升迁迅速。由于他文质彬彬又有辩才，因此他经常应邀去各种专门学校进行演讲。那些学校反对国王独裁统治的情绪十分强烈，他们不仅要打倒国王，还要推翻独裁政府。在这反独裁、废黜国王、创建共和政府、内战纷纭的年代，卡雷拉在特别努力地从事着一项工作：力图将那些加入到托洛茨基党或无政府主义工团党派的人争取过来，或者说重新争取过来。来自于莫斯科的旨在降低托洛茨基派威信的压力颇大，因此，到1936年夏天大战胜将来临时，劳尔·卡雷拉已被教育训练得爱憎分明。他深信托洛茨基派是头号敌人。他想，如果没有他的搞分裂的恶劣影响，共产党的力量将会壮大，接收无政府主义者，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地吞掉共和党。当所有这些任务都完成之后，再搞倒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①就不成问题了。不过，他也承认，反对派现在正越来越团结一致。并且，正如共和党人正在接受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一样，佛朗哥也正在接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火援助。

① 西班牙独裁者。1936年发动反共和政府的叛乱，1939年夺得政权。

1937年4月初，党的书记乔斯·加里罗通知劳尔·卡雷拉，莫斯科要召见他。他当然去了，是怀着极大（也有些压抑）的激动心情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尔·卡雷拉变得更加平静内向；他的谈吐举止几乎更带有文雅谦逊的风度，而丝毫没有神气活现的派头。但是他的思想火焰却从未减弱。

在莫斯科，卡雷拉被带到一处军营，这里曾经一度是年轻军官的营地。他被指定在一个小房间里住，并且得知，克格勃^①的勃里斯·波尔金少校将于翌日上午接见他。他把后半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都用在去红场朝圣。他得排两个小时的队才能进里面瞻仰列宁的遗容。他提醒自己，13年前他曾发誓要为列宁报仇。他看着那副留着严峻胡须的苍白的面孔。如果不是卫兵粗率地告诉他往前走，他将会在那里呆上一夜。假如让他长时间地在那里守灵，他也是不会说二话的。

退到陵墓之外时，卡雷拉很希望能有个熟人领他四处转转。他一直在学习俄语，基本上能看懂俄语导游手册。事实证明，他的确具备学习语言的才能，他的英语和法语都十分流利。就好似受到了磁铁吸引一样，他打算去一趟大学。他先看了一阵子地铁路线图，接着就算计起来，算得象往常那样精确；他在鄂木斯克站下了地铁，径直向学生会大楼走去。

在那宽阔的正厅里，他看见左面墙壁上张贴着许多宣传画：斯大林和一个小姑娘在一起：小姑娘在斯大林生日之际向他献花；斯大林和一个农民在一起：农民尊敬地低着头，斯大林象慈父一般地拍着他的肩膀；斯大林和军队在一起：

① 苏联国家安全局。

武装部队节之际，军队在向他欢呼；斯大林为一艘海军舰艇题词赋诗。卡雷拉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那是去年关于列宁的“遗嘱”的议论，说到列宁遗嘱里提醒共产党员要警惕约瑟夫·斯大林。但是他却满意地相信，那是伪造的，可能是由那个共产党团体的最大敌人列昂·托洛茨基编造的。这时，他看见一个体格健壮的姑娘正低头伏在桌子上读当天的报纸。也许是受到异国情调和孤独感的驱使，他走过去同她搭讪。

“请原谅，我是来自西班牙的劳尔·卡雷拉同志。我是为公事而来。我可以和您说说话吗？”

姑娘毫无笑容地抬起头，看了看眼前这位身材瘦削、有着摩尔人^①脸色的特征的年轻人，用沙哑的声音问：

“我能帮您什么忙吗？”

劳尔想，他是否该问哪些惯例的问题呢？比如问她到中心书库怎么走，或者到哪买芭蕾舞票？然而，从他嘴里吐出来的却是：

“您愿意和我一起去喝杯茶或者喝杯咖啡吗？”

她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把她的一包书塞进一个帆布袋里，扣上她身上穿着的粗毛衫的扣子。此时是4月，天仍有凉意，虽然并不冷。她说：

“您的俄语说得不太好，而我又不会西班牙语。您会说德语或者法语吗？”劳尔高兴地回答他会讲法语。这样，他们就边用法语聊着，边走出了楼。她领他来到几条街区之外的、主要是学生常去的一处小店。这里的服务是自助餐厅式的，可供选择的食品有几种粗糙面包和烤点心，还有香肠、土豆、胡萝卜、乌克兰红葡萄酒、伏特加酒、啤酒和茶。劳

^① 指非洲西北部柏柏尔人的后裔，现泛指这一带的伊斯兰教徒。